

## 《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怎么来的

■龚延明

1995年,我向高校古委会申请《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得到批准;继而2003年,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2年,经专家中期评估,提升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

总之,古委会批准立项的这个开头,意味着一颗红色的革命种子播种下去,之后才有生根、发芽、耕耘、开花,历经二十四年书生长征,终于走到结出硕果的今天,完成了1000万字的《宋代登科总录》(2014年出版)、1500万字的《明代登科总录》(今年出版)、1400万字的《清代登科总录》(明年交稿),以及另外两个子课题《隋唐五代登科总录》(100多万字)、《辽金元登科总录》(近100万字),总字数超过4000万的工程。

这漫长的二十四年,对我是否有坚定的学术信念,是否有坚强的工作毅力,是否有组织、协调研究团队的能力,是否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一次严峻考验。我挺过来了,自感欣慰。

中国有句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没有最初在高校古委会的立项,今天的一切,都归于零!所以,我要感恩高校古委会的学术眼光,感恩古委会主任安平秋教授的支持!我缺乏科研经费最困难的时候,古委会连续追加了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不能再追

加了。我有时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安先生知道我的困境,准备动用主任基金,追加四万元,感动至今!好在,浙大社科院雪中送炭,将其列入“211”“985”项目,拨款十余万。更重要的是,2012年提升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一下子获得80万元资助,从此缓解了科研经费问题。

关于《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我自以为有几个亮点:

第一、原创性强。所收自隋唐至清代十多万进士,每个进士一小传,列登科人姓名、字、号、籍贯,有仕履的亲属,哪年登科,初授官,最重要历官,终任官,谥号。每个小传,都有书证支撑,每一条书证都是从第一手科举文献和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抄录下来。可以说“字字有来历,条条有出处。”

我们如何重视第一手史料,举一个例子:2014年,《清代登科总录》资料搜集已快完成时,总字数已近千万,正在这时,浙大图书馆购进了人大《清史》编委会编的800册《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版有《全清文》《全清诗》,这是清代科举人物金矿。浙大图书馆黄展副馆长十分重视大型从文书库建设和碑拓数字化建设,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二楼就是大型文科丛书书库。我们课题组就在图书馆六楼,庭院修竹摇曳,明窗正对

保俶塔,天天提醒我不要忘记研究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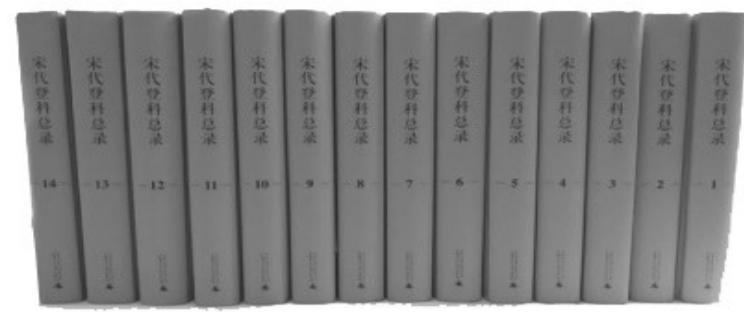
这样的环境,利用《清代诗文集汇编》十分方便。我立即安排引进人才周佳,用一至二年时间,专门负责将此《汇编》翻阅一遍。周佳已从此《汇编》中辑录了百余万字进士史料,大大丰富了清代26000多名进士的书证。至于420册《清代朱卷集成》、30册《清代履历档案全编》及《搢绅录》《爵秩全览》等等,无不检阅过。正因为都是利用第一手资料,保证课题研究原创性,所以工作量大,投入课题时间长。正所谓“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第二、学术性强。做课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登科总录》从唐朝做起?还是从隋朝做起?徐松《登科记考》从唐代开始,没有收隋代进士。学术界关于科举试自唐开始还是从隋开始?有争议。为此,我们专门梳理了《隋书》、唐宋文献中有关科举制起源的史料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确认中国科举考试取士始于隋。于是我和浙大教授祖楚合作写了一篇《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再商榷》一文,发表在2006年6月《历史研究》上。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隋代登科录》,有秀才科、进士科、孝廉科、明经科、制举,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孔颖达,就是隋大

业初明经及第,初授河南郡博士。

又如,我在做《宋登科总录》时,遇到一个如何鉴别进士的问题。明、清文献记载的“进士”,通常就是及第进士。可宋代记载中的进士,如“业进士”“习进士”“举进士”“州进士”“京府进士”等等,都不是及第进士。为了在翻阅文献时不至误读,我作了较细致的探究,写了一篇《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发表在1996年出版的第41辑《文史》上,这对课题组十分有用。想不到,此文居然得到“科举学”倡导者、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的青睐,将它选入《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之中。

再如,《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是海内外研究中国明清科举常用工具书,学者统计明清进士分布与流动时,其数据就来自此书。然而,此书遗漏不少。比如,洪武十八年进士碑,该榜因有参与削藩的探花黄子澄,在“靖难之役”后,被明成祖下令摧毁,此榜472名进士,残碑仅存293名。虽经后人利用方志补阙了108名,尚缺50名进士。我们做明代登科录,总不能将阙就阙。为此我与博士生邱进春(现在江西师大)专门进行了深入探究,于2007年完成了明代洪武十八年进士的发覆,完整地收录了472名进士。其成果在2007年第3期《浙江大学学报》上发表。光这



一榜进士,就这样厚厚一本,180页。明代科举试89榜,也就是89册。我们就是这样,坚持将学术研究与做课题紧密结合,以保证课题成果的学术质量。

第三、研究方法实证兼具数字化,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开拓了多元利用课题成果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我们做课题搜集资料,都是传统的方法,做卡片。可是,我们这个课题太大,如宋代,就收录了41040名进士,平均一个人四张卡片,也有16余万张卡片,每个进士的书证卡片归类、查检,很费时;更大麻烦是,宋代118榜进士,有文科、武科,制科与常科等不同科目,十几万张卡片,输入电脑,榜次、科目、姓名不辨,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无法查阅。输入成了大问题,现实逼使我进行跨学科研究。我聘请了浙大计算机老师,按我的设计,编制《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数据存入和筛选查检软件。科目、榜次、登科年代、姓名笔划都用数字代替。凡输入一条资料,就会自动归类至那一朝、那一榜、那一科目,除前三名外,一律按姓名笔划

排序,终于解决了这道难题。为了进一步提高课题组工作效率,技术性输入活儿,我聘用了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兼职输入员,所有卡片,以及后来不做卡片后的电子稿,都由输入员按规定程序统一输入,这样,可以任意检索进士和补充史料。如果需要,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所有贮存在电脑中的进士数据,自隋至清,按不同朝代,拉出上千万字的登科录Word文本。

那时还没有数据库概念。从90年代末,我实际上已开始做原始的中国历代科举人物数据库了。我确实体会到,数字化研究方法,带来了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革命。

实证兼数字化的研究方法,是对科举文献整理、研究方法的革新。但其研究成果,若要转化为数字化的产品,这不是作者权限内的事。因数字化版权在出版社。必须经出版社出具协议之后,由专业化的数据公司担当。数字化公司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我联系上了实力强劲的中华书局古联数据库公司,使我学会了开始使用“籍合员”,最终,《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呈现在大家面前。

## 增强“四力” 做“人民的记者”

■费伟伟

历史是培育信仰的源泉。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共青团中央团校学员,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到采访。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冯文彬将她带到毛主席面前介绍说:“主席,她是人民日报记者。”毛主席微笑着握住金凤的手说:“哦,人民日报记者,人民的记者。”

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二次说这句话。

194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记者柏生跟随后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采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议休息时,毛主席和代表们一一握手。“主席迎着我的面走来,问我是哪个地区的代表,我有些拘谨地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笑着点点头说:‘哦,人民的记者。’”柏生后来回忆道。

人民的记者!

70年过去,毛主席的教导已成为踏入人民日报大门的新闻人神圣的信仰。尤其是李庄、金凤、柏生所在的人民日报记者部。

信仰培育精神,精神产生力量。

人民日报记者部(2009年改名地方部)是“全国新闻工作先进集体”,先后走出多名全国党代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涌现出一批获中国新闻奖(全国好新闻奖)的优秀记者。人民日报纪念创办60周年时,记者部出过一本《人民日报记者部新闻实践与思考·灿烂的星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为该书作序时写道:“人民日报驻地方记者是人民日报的‘重要方面军’,是一支有战斗力、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

对新闻事业有澎湃激情的队伍。一句话,是一支可敬可爱的队伍。”

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所以能写出一篇篇接地气、有灵气、鲜活生动的好稿子;对新闻事业有澎湃激情,所以还能在紧张采写工作之余,写下许多理论联系实际、启人思迪的调研业务研讨文章。

近年来,我以人民日报社地方部的业务研讨文章为依据,编写了《典型人物采访与写作》《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两本书。中宣部决定在思想宣传战线开展“四力”教育实践活动,人民日报出版社和我商量,可否围绕增强“四力”这个主题,将人民日报驻地方记者在这方面的实践与思考编一本书,作为思想宣传战线开展“四力”活动的参考书。我欣然允诺。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之欣

然,在于身处其中,对这支队伍的了解;我之欣然,更在于对这支队伍政治水平、业务能力的坚信。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光阴荏苒,不变的是一代代年轻新闻工作者的忠诚。对人民日报的饱满热情没有变,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变,对新闻事业的澎湃激情没有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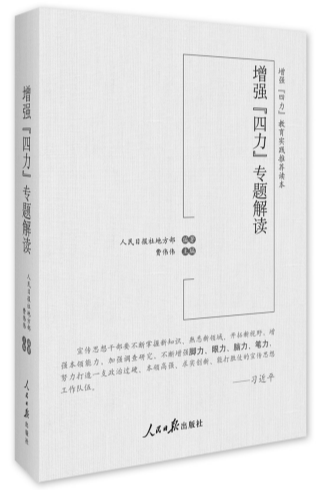
本书共分四辑。第一辑为《“脚力”:好新闻永远在基层》,第二辑为《“眼力”:在观察、发现、辨别中增强定力》,第三辑为《“脑力”:树立问题意识自觉服务大局》,第四辑为《“笔力”:多写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每辑各收录7篇新闻业务研讨文章及相应的新闻作品,大都为近几年人民日报地方分社记者的新作。

由于本书侧重于对“四力”的

思考和解读,故编辑体例上是以文带稿——以对新闻采写业务的思考加上相关的新闻报道,而非非整体上对这支队伍所贡献的优秀新闻作品作展示。受此局限及本书篇幅的限制,很多优秀记者没有列入,很多精彩的报道也没能包括在内。但阅读此书,仍可由一斑而窥全豹。

张研农社长在《灿烂的星河》一书序中说:“人民日报的地位和规格,要靠记者的素质和人格来实现。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民日报记者深入现场、不怕吃苦的形象,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形象,清正廉洁、弘扬正气的形象,与时俱进、不甘平庸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形象。”

读完本书,相信您一定会也认同这样的评价,也一定会进一步深化对如何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费伟伟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4月,定价:42.00元

力”的认识,增强用心用情用力地为新时代写出好报道的信心。

编辑本书的过程,于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次受教育的过程。我为自己工作、战斗的这个集体而更加自豪——“人民的记者!”

## 北京围棋故事多

■祝晓风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这底蕴与内涵,主要的不是那些不动产,而是那些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叫遗产也行,叫文化活动也行。而围棋,是其中之一。

据载,围棋在北京流行,始于明代。开国皇帝喜欢围棋,以后的皇帝里,也很有几位爱好围棋的。到了清代,围棋一度兴盛,国手云集北京,徐星友、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等都曾在北京争得荣耀。棋迷们聊起中国围棋,常说一句话,叫国运兴则棋运兴。晚清以降,国运衰微,棋运可叹。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围棋才迎来新生。但后来又遭遇十年浩劫,元气大伤。改革开放以后,国运昌盛,围棋才真正迎来黄金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十一连胜,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人心向上的,国力快速上升的最形象的写照。

北京围棋故事多。解放后,尽管有一段时间,上海的围棋水平高于北京——因为上海有一个棋迷市长陈毅。但北京毕竟是首都,体育总局在北京,中国围棋国家队在北京,所以,北京的围棋故事,多少也就有了中国围棋故事的内容在里面。这里有三个要素,一是北京,这是一个空间,我们讲的,都是以这个空间为主,为中心的;二、活动的内容是围棋,而不是踢足球或者造飞机;三是最重要的,下棋的人,还有与下棋有关的人。这些北京的围棋故事,主角是这些人,这些有名无名的棋士。

民国时期,执政段祺瑞对北京围棋的发展,起了独特的作用。新

中国围棋的倡导者陈毅元帅对段祺瑞有一个评价,他说,段祺瑞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下围棋和提倡围棋——这个评论是公允的。吴清源在北京少年成名。这位20世纪世界围棋最强者,正是从北京开始他的“明”世传奇。那个棋茶馆在宣武门外,叫海丰轩。少年吴泉也曾出入段府,受过执政的资助。1926年,日本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三段来华访问,在北京巨商李律阁府上与12岁的吴清源对弈。岩本败吴三子,吴胜,后改让二子。岩本小胜。1927年,吴清源执白战胜刘槐树。

当时中国围棋的格局是南北对峙,南方的中心是上海,北方的中心是北京,刘槐树当时是北京围棋执牛耳者,吴清源击败刘槐树,实际上成为北方围棋第一人。这一年,日本51岁的井上孝平五段来到北京,北京名流全力撮合井上孝平与13岁的吴清源对弈。井上孝平先在张作霖创办的棋社授二子与吴清源对弈两局,两局都以中盘打挂(即暂停)告终,但从棋的进程看是吴清源的胜局。后来井上又在青云社、李律阁府邸和张伯驹府邸让先与吴清源对弈三局。井上将对局棋谱传到日本,瀚越奕作亲自对这几局棋进行了点评,认为吴清源是“秀策再生”。1934年,出国六载,已经身为日本围棋职业五段的吴清源回国访问,其时段祺瑞已经移居上海霞飞路。吴清源特别造访段府,探望年近70的段祺瑞。段当时患有严重溃瘍,出血不止,精神萎靡困顿。一老一少再次纹枰对坐手谈,结果是吴清源以小败终局——一年多后,史家罗京生评说,“个中含意,不言自明”。

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的王汝南八段写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弈坛争霸三十年——从冠军之战探索中国围棋的发展》。吴清源在北京少年成名。这位20世纪世界围棋最强者,正是从北京开始他的“明”世传奇。那个棋茶馆在宣武门外,叫海丰轩。少年吴泉也曾出入段府,受过执政的资助。1926年,日本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三段来华访问,在北京巨商李律阁府上与12岁的吴清源对弈。岩本败吴三子,吴胜,后改让二子。岩本小胜。1927年,吴清源执白战胜刘槐树。

而刘槐生于围棋,于北京围棋的贡献,并不只于他是一位国手,而是他为北京围棋的发展建设,奉献了许多心力。解放后,刘槐生客居上海,看到昔日的棋友都成为国家正式职工,衣食无忧,工作就是研究棋艺,十分羡慕。他萌生出一个念头,即发挥他在北京生活多年,人头熟络的优势,到北京干一番事业。他把他的想法正在上海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说了,得到黄炎培先生的大力支持。黄老建议他到北京去,把这个想法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也喜欢下围棋的李济深先生谈一下。1950年夏天,刘槐生到北京,见面李济深先生。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李济深先生,深得李济深先生的赞许。后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由著名法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出面,解决了棋社的社址问题;周总理亲笔批下款项,“责成文化部拨款七千元,筹建棋社”。而“北京棋艺研究社”七个大字,则是李济深先生的手笔。研究社成立后,不惜重金订购了日本全套围棋刊物,又在国内采购各种围棋书

籍和古谱,逐渐成为国内第一家较为完整的围棋资料中心。号称“北方四老”的过惕生、崔云趾、金亚贤、雷葆申在新社会也解除了衣食之忧,可以一门心思研究棋艺。

从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到1980年12月18日北京棋院正式成立,这中间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折,多少跌宕起伏。这中间就有一位女英雄,叫做沈尺脚。沈尺脚这个名字,外界知道的可能不多,但是在北京乃至全国棋界都是大名鼎鼎,因为她是北京围棋的头号女功臣。她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沈仲长是清末进士,酷爱围棋。沈尺脚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也学会了下围棋。解放后,沈尺脚积极要求进步,进入华北革命大学(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毕业后参加志愿军赴朝。沈尺脚原在国家建工部做机要工作,深受部领导器重,后来改行搞体育纯属偶然。从1962年,沈尺脚调入北京体工大队开始,她就为挑选学员操心,为进行学员家访操心,为寻找训练和比赛场地操心,为恢复北京棋类运动队操心,为应付比赛借调队员操心,还要为调离王林、程晓流回北京的问题操心。1964年北京少儿围棋赛举办不久,北京围棋队领队沈尺脚就到吴玉林和程晓流家里做家访,动员他们两人加入北京围棋队。沈尺脚是眼看着北京围棋事业在几十年中的曲折发展。文革中,为成立北京围棋队,沈尺脚不知打了多少报告。1974年,沈尺脚甚至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写信。就在这一年,沈尺脚又为调离王林回北京,专门给北京

市委写报告;就在沈尺脚写这个请示报告的时候,聂卫平正在北大荒山河农场起猪圈。聂卫平在参加了国家集训队的集训后,本来已被列入即将访问日本的中国围棋代表团名单中,可是因为当时出国要做政审,而他所在的山河农场拒绝为他做政审,并且催他回去,聂卫平万般无奈,不得不返回农场。后来聂卫平在其自传中写到这一段时说,这段经历让他一生刻骨铭心。

这些事情,虽然都是围棋史,但它们的意义绝不限于围棋。还有60年代的中日围棋交流,其意义也远远不限于体育,而是与乒乓外交一样,成为围棋外交,成为中国当代史中的重要一部分。

《当代北京围棋史话》(罗京生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的作者罗京生先生,是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记者,从工作的角度讲,是我的前辈。罗先生在光明日报,长年负责体育报道,与棋界名流交往甚多。罗先生为人谦和、朴实,他本人也擅长围棋,是报社同事中的高手。记者写史,有一大长处,是写实,没有虚构,是可以当做真正的史来看的,是可以引用的。此书大量的内容,是他亲自采访所得,许多内容是第一次披露的第一手资料。大量比赛的记录,大量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大量档案资料的引用,使这本书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书中一些内容,虽然我们这些老棋迷也略知一二,但如果读此书,就完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没有一个史的框架。是罗先生的妙手,将这些故事编织到一起,有点有线还有面,



《当代北京围棋史话》,罗京生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既有史的纵向的梳理,又有对重点人物,如过惕生、沈尺脚、聂卫平等人的深入展开。故事一直讲到21世纪,讲到近年来的围甲,讲到了孔杰、古力、陈耀烨。许多故事,作者都在真实有据的前提下,讲得细致生动,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书中提到的一些棋界人士,如电影编剧、棋迷李洪洲先生,中国棋院院长王汝南先生,我都在“天地间”见过。与李先生,我还和他交过两次手,虽然不是他的对手,但这手谈本身,却是值得回味的回忆。

3年前,在光明日报一楼的“天地间”本手道“见到罗先生,他就说他在应约写一本关于北京围棋的书。我当时就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与他相约,书出版时,我要写篇文章。去年年底,罗先生把此书的电子版发给我,让我先睹为快。作为一个有30多年爱棋历史的资深铁杆棋迷,我读这本书的满足,可想而知。这份儿高兴不能独享。现在,把我读到的几个故事和自己的一点儿读后感,写在这里,与诸多棋友分享。